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 颜氏家训集解

王利器 撰



中 华 书 局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 颜氏家训集解

王利器 撰



中 华 书 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撰. —北京:中华书局,2014.9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10291-8

I. 颜… II. 王… III. ①家庭道德-中国-南北朝时代②《颜氏家训》-研究 IV. 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5599号

- 
- 书 名 颜氏家训集解  
撰 者 王利器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石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9月北京第1版  
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2<sup>3</sup>/<sub>8</sub> 插页2 字数568千字
-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291-8  
定 价 58.00元
-

## 叙 录

自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颜氏家训是一部影响比较普遍而深远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写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等所记庭帙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这一则由于儒家的大肆宣传，再则由于佛教徒的广为征引<sup>〔一〕</sup>，三则由于颜氏后裔的多次翻刻；于是泛滥书林，充斥人寰，“由近及远，争相矜式”<sup>〔二〕</sup>，岂仅如王钺所说的“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sup>〔三〕</sup>而已！

唯是此书，以其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前人于其成书年代，颇有疑义。寻颜氏于序致篇云：“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篇云：“不忘诚谏。”省事篇云：“贾诚以求位。”养生篇云：“行诚孝而见贼。”归心篇云：“诚孝在心。”又云：“诚臣殉主而弃亲。”这些“诚”字，

都应当作“忠”，是颜氏为避隋讳<sup>〔四〕</sup>而改；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家道罄穷。”明指隋家统一中国而言；书证篇“裸股肱”条引国子博士萧该说，国子博士是该入隋后官称<sup>〔五〕</sup>；又书证篇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这些，都是入隋以后事。而勉学篇言：“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书证篇引广雅云：“马薤，荔也。”又引广雅云：“晷柱挂景。”其称广雅，不像曹宪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讳而改名博雅。然则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此书既成于入隋以后，为何又题署其官职为“北齐黄门侍郎”呢？寻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陈书蔡凝传写道：“高祖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这可见当时对于黄散之职的重视。之推在梁为散骑侍郎，入齐为黄门侍郎，故之推于其作品中，一则曰“忝黄散于官谤”<sup>〔六〕</sup>，再则曰“吾近为黄门郎”<sup>〔七〕</sup>，其所以如此津津乐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门兼美”吧。然则此盖其自署如此，可无疑义。不特此也，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而直斋书录解題十六又著录：“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则史学家、目录

学家也都追认其自署,而没有像陆法言切韵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称其入隋以后之官称为“颜内史”<sup>〔八〕</sup>了。

在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年代里,长江既限南北,鸿沟又判东西,战争频繁,兵连祸结,民生涂炭,水深火热。于斯时也,一般封建士大夫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 王俭褚渊碑文写道:“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业,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著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sup>〔九〕</sup>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写照。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禅代之际,先起异图”<sup>〔一〇〕</sup>，“自取身荣,不存国计”<sup>〔一一〕</sup>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sup>〔一二〕</sup>,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得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sup>〔一三〕</sup>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sup>〔一四〕</sup>;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sup>〔一五〕</sup>。一方面宣称“生不可惜”<sup>〔一六〕</sup>，“见危授命”<sup>〔一七〕</sup>;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sup>〔一八〕</sup>，“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sup>〔一九〕</sup>。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靦冒人间,不敢坠失”<sup>〔二〇〕</sup>。“一手之中,向背如此”<sup>〔二一〕</sup>,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sup>〔二二〕</sup>。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混躯而济国,君子不咎。”<sup>〔二三〕</sup>甚

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sup>〔二四〕</sup>，北齐宦者田敬宣之“以学成忠”<sup>〔二五〕</sup>，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sup>〔二六〕</sup>；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sup>〔二七〕</sup>。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sup>〔二八〕</sup>、“往来宾主如邮传”<sup>〔二九〕</sup>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sup>〔三〇〕</sup>，“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sup>〔三一〕</sup>，就可以“为汝曹后车”<sup>〔三二〕</sup>吗？然而，后来的封建士大夫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sup>〔三三〕</sup>。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

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唐人崔涂曾有一首读庾信集诗写道：“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sup>〔三四〕</sup>我们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sup>〔三五〕</sup>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sup>〔三六〕</sup>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阝危鬼录，三代之悲，刷于荼蓼，晚著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

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sup>〔三七〕</sup>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sup>〔三八〕</sup>，于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说起来好像头头是道，面面俱圆，而内心实则无比空虚，极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写道：“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这是他由衷的自白。纪昀在他手批的黄叔琳节钞本中一再指出：“此自圣贤道理。然出自黄门口，则另有别肠——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此所谓貌似而神离。”<sup>〔三九〕</sup>“极好家训，只末句一个费字，便差了路头。杨子曰：‘言，心声也。’盖此公见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sup>〔四〇〕</sup>“老世故语，隔纸扞之，亦知为颜黄门语。”<sup>〔四一〕</sup>纪氏这些假道学的庸言，却深深击中了这位真杂学<sup>〔四二〕</sup>的要害。当日者，颜氏飘泊西南，间关陕、洛，可谓“仕宦不止车生耳”<sup>〔四三〕</sup>了。他为时势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sup>〔四四〕</sup>。梁武帝萧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练<sup>〔四五〕</sup>，后又舍身同泰；颜氏亦向风慕义，直至归心。梁元帝萧绎崇玄，“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sup>〔四六〕</sup>；颜氏虽自称“亦所不好”，然亦“颇预末筵，亲承音旨”<sup>〔四七〕</sup>。当日者，梁武之饿死台城，梁元之身为俘虏，玄、释二教作为致败之一端，都为颜氏所闻所见，他却无动于中，执迷不悟，这难道不是像他所讽刺的“眼不能



见其睫”<sup>〔四八〕</sup>吗？他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sup>〔四九〕</sup>之际，又想成为“专儒”<sup>〔五〇〕</sup>，又要“求诸内典”<sup>〔五一〕</sup>。当日者，梁武帝手敕江革写道：“世间果报，不可不信。”<sup>〔五二〕</sup>王褒著幼训写道：“释氏之义，见苦断身，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sup>〔五三〕</sup>因果报应之说，风靡一时，于是颜之推也推波助澜地倡言：“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sup>〔五四〕</sup>又劝诱他的子弟：“汝曹若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身难得，勿虚过也。”<sup>〔五五〕</sup>他这一席话，难道仅仅是在向他的子弟“劝诱归心”<sup>〔五六〕</sup>而已吗？不是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场”<sup>〔五七〕</sup>。何孟春就曾经指出：“是虽一家之云，而岂媁媁私焉为其子孙计哉？”<sup>〔五八〕</sup>南宋时，黄震在晓谕新城县免仇杀榜写道：“人生难得，中土难生。”<sup>〔五九〕</sup>这八个字，不是这个理学家平白无故地拮据前人牙慧，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为要熄灭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而使用的釜底抽薪的亘古心传。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苦难世界的灵光圈。”<sup>〔六〇〕</sup>恩格斯也尖锐地指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

家、律师和国家的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sup>〔六一〕</sup>颜之推正是这样的哲学家。

颜氏此书，虽然乍玄乍释，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sup>〔六二〕</sup>，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sup>〔六三〕</sup>，而其“留此二十篇”<sup>〔六四〕</sup>之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sup>〔六五〕</sup>。这是封建时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唯一主题。

但是，今天我们整理此书，诚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sup>〔六六〕</sup>，则此书仍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

此书涉及范围，比较广泛。那时，河北、江南，风俗各别，豪门庶族，好尚不同。颜氏对于佛教之流行，玄风之复扇<sup>〔六七〕</sup>，鲜卑语之传播<sup>〔六八〕</sup>，俗文字之盛兴<sup>〔六九〕</sup>，都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至如梁元帝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炆”<sup>〔七〇〕</sup>，使宝贵的文化遗产，蒙受历史上最大的一厄<sup>〔七一〕</sup>；以及“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sup>〔七二〕</sup>；以及当时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sup>〔七三〕</sup>；以及俗儒之迂腐，至于“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sup>〔七四〕</sup>。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文献，提供给我们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外此其馀，颜氏对于研讨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亦作

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此书对于研究南北诸史,可供参考。颜氏作品,除观我生赋自注外,像风操篇所言“梁武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亶<sup>[七五]</sup>; 勉学篇所言“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这个人就是王翼<sup>[七六]</sup>; 文章篇言“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这个人就是姜质<sup>[七七]</sup>; 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珽、徐之才<sup>[七八]</sup>,这些,都可以补证南北诸史。教子篇所说的高俨<sup>[七九]</sup>,兄弟篇所说的刘瓛<sup>[八〇]</sup>,治家篇所说的房文烈<sup>[八一]</sup>和江禄<sup>[八二]</sup>,风操篇所说的裴之礼<sup>[八三]</sup>,勉学篇所说的田鹏鸾<sup>[八四]</sup>和李恕<sup>[八五]</sup>,文章篇所说的刘逖<sup>[八六]</sup>,名实篇所说的韩晋明<sup>[八七]</sup>,归心篇所说的王克<sup>[八八]</sup>,风操篇所说的武烈太子萧方等<sup>[八九]</sup>,这些,都可与南北诸史参证。而风操篇所说的臧逢世<sup>[九〇]</sup>,慕贤篇所说的丁覩,涉务篇所说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马云云<sup>[九一]</sup>,这些,更足补梁书之阙如。慕贤篇所说的张延雋<sup>[九二]</sup>,勉学篇所说的姜仲岳,这些,更足补北齐书之俄空。又如杂艺篇所说常射与博射之分,则提供给我们弄通南史柳恽传所言博射之事。

第二,此书对于研究汉书,可供参考。旧唐书颜师古传写道:“父思鲁,以学艺称。……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大颜、小颜之精通汉书,或多或少地都受了家训的影响。

如书证篇言“犹豫”之“犹”为兽名，汉书高后纪师古注即以犹为兽名；同篇引太公六韬以说贾谊传之“日中必昃”，师古注亦引六韬为说；同篇又引司马相如封禅书“导一茎六穗于庖”，而训导为择，师古注亦从郑氏说，训导为择。这些地方，师古都暗用之推之说，尤足考见其遵循祖训，墨守家法，步趋惟谨，渊源有自也。

第三，此书对于研究经典释文，可供参考。经典释文是研究儒、道两家代表作品的重要参考书。纂写经典释文的陆德明，是颜之推商量旧学的老朋友，他们的意见，往往在二书中可考见其异同。如书证篇言“杙杜，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此大误也”；诗唐风杙杜释文则云：“本或作夷狄之狄，非也。”书证篇言“左传‘齐侯痄，遂疔’……世间传本多以痄为疥，……此臆说也”；释文则引梁元帝之改疥为痄，此尤足考见他们君臣间治学的相互影响之处。书证篇引王制“羸股肱”郑注之“擗衣”，谓：“萧该音宣是，徐爰音患非。”释文则云：“擗旧音患，今宜读宣，依字作擗，字林云：‘擗臂也，先全反。’是。”音辞篇言：“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释文叙录条例则云：“质有精粗，谓之好恶；心有爱憎，谓之好恶。”至如书证篇言：“诗云黄鸟于飞，集于灌木。传云：灌木，丛木也。”“近世儒生，因改为叡”，而有徂会、祖会之音之失，更可订正释文所下徂会、祖会、亦外等犯的错误。

第四，此书对于研究文心雕龙，可供参考。如文章篇

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文心雕龙宗经篇则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记传盟檄（从唐写本），则春秋为根。”与颜氏说可互参，这是古代主张文章原本五经的代表作。同篇又云：“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货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消；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诃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文心雕龙程器篇则云：“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竇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黷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恹恹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哺啜而无耻；潘岳诡诘于愍、怀；陆机倾

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颜氏论证，与之大同。同篇又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心雕龙附会篇则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色；然后品藻玄黄，摘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他们所持的文学理论，都以思想性为第一，艺术性为第二。不过，之推所谓事义偏重在事，彦和所谓事义偏重在义，故一为皮肤，一为骨髓，非有所抵牾也。萧统文选序写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很好地说明了二者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第五，音辞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所当措意。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序写道：“黄门此制，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摘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sup>〔九三〕</sup>

外此其余，在重道轻器的封建历史时期，他对于祖暅之的算术<sup>〔九四〕</sup>，陶弘景<sup>〔九五〕</sup>、皇甫谧、殷仲堪<sup>〔九六〕</sup>的医学，都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难能而可贵的。

这部集解，是以卢文弨抱经堂校订本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续家训<sup>〔九七〕</sup>、罗春本<sup>〔九八〕</sup>、傅太平本<sup>〔九九〕</sup>、颜嗣慎本<sup>〔一〇〇〕</sup>、程荣汉魏丛书本<sup>〔一〇一〕</sup>、胡文焕格致丛书本<sup>〔一〇二〕</sup>、何允中汉魏丛书本<sup>〔一〇三〕</sup>、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

种本<sup>〔一〇四〕</sup>、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sup>〔一〇五〕</sup>、文津阁四库全书本<sup>〔一〇六〕</sup>、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sup>〔一〇七〕</sup>、屏山聂氏汗青篋刊本<sup>〔一〇八〕</sup>。我所见到的还有嘉庆丁丑廿二年南省颜氏通谱本，以其所据为颜本，无所异同，且间有新出讹谬之处，故未取以雠校。其它援引各书，亦颇夥颐，不复一一覩缕了。

此书在唐代，即有别本流传，如归心篇“儒家君子”条以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引作“诚杀、家训”，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且著录之推诚杀一卷，则唐代且以此单行了。同篇之“高柴、折像”，广弘明集“折像”作“曾晰”，原注云：“一作‘折像’。”凡此都是唐代有别本之证。而广弘明集卷三引归心篇“欲顿弃之乎（今本‘乎’作‘哉’）”句下，尚有“故两疏得其一隅，累代咏而弥光矣”两句，则本书尚有佚文；这当是颜书之旧，固非郭为棘所引风操篇“班固书集亦云家孙”之下，尚有“戴遂称安道则家弟”一句<sup>〔一〇九〕</sup>之比（此乃郭氏妄为窜入，因为乾隆时人所见家训，不会多于今本）。宋淳熙台州公库本，今所见者，系元廉台田氏补修重印本，故间有不避宋讳之处。此本颇有影钞传世者，知不足斋丛书即据述古堂钞本重刻（无校刊名衔），光绪间，汗青篋又据以重刻。卢文弨校定本所据宋本，盖亦钞本，故与宋本时有出入，翁方纲讥其未见宋本<sup>〔一一〇〕</sup>，是也。我所据的，尚有海昌沈氏静石楼藏影宋钞本及秦曼君校宋本。此外，又得见董正功续家训宋刻残本卷六至卷八

共三卷,此书除全引颜氏原文可供校勘外,颇时有疏证颜书之处,今亦加以甄录<sup>〔一〕</sup>。惜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载之七卷本半宋刻半影钞者,祁承燦淡生堂藏书目丛书类所载颜氏传书八种中之颜氏家训,今亦不可得而见矣。外此其余,如敦煌卷子本勤读书钞(伯·二六〇七)、刘清之戒子通录<sup>〔一二〕</sup>、胡寅崇正辨<sup>〔一三〕</sup>、吕祖谦少仪外传、曾慥类说<sup>〔一四〕</sup>等,亦颇引颜书,多为前人所未见或未及征引,今皆得而讎校之,于以是正文字,实已不无小补,不知能免于颜氏所讥之“妄下雌黄”<sup>〔一五〕</sup>否也?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颜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这部著作从事集解之外,我还把颜之推传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统统辑辑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参考。本书脱稿后,承杨伯峻同志拨冗审阅,谨此致谢。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

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三次增订

〔一〕道宣广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法琳辨正论、祥迈辨伪录、法云翻译名义集等都征引颜氏家训。

〔二〕〔三三〕陆奎勋陆堂文集三训家恒语序。案: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二先大夫行述:“公幼从王先生儒学问,戒以躬行为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编诸书,公守而行之。至是书陶靖节诗、颜氏家训为一编以寄意。”举此一端,亦足以见其书影响之大矣。

〔三〕王钺读书丛残。



- [ 四 ] 隋文帝杨坚父名忠，见隋书高祖纪上。
- [ 五 ] 隋书儒林何妥传：“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
- [ 六 ] [二八] [三一] [三六] [七〇] 观我生赋。
- [ 七 ] 止足篇。
- [ 八 ] 据泽存堂本广韵，古逸丛书本则作“颜外史”。
- [ 九 ] 文选卷五八。
- [一〇] 李百药北齐书杜弼传史臣曰。
- [一一] 姚思廉陈书后主纪史臣曰。
- [一二] [三二] [六四] 序致篇。
- [一三] [一七] [二一] [二五] [二七] [三五] [四六] [四七] [五〇] [六五] [六七] [七三] [七四] [一一五] 勉学篇。
- [一四] [一五] [四一] [四四] 文章篇。
- [一六] [一九] [二三] [二四] [二六] [六二] [九五] 养生篇。
- [一八] [四九]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六三] 归心篇。
- [二〇] [五一] 终制篇。
- [二二] 观我生赋自注。
- [二九] 全唐诗詹敦仁劝王氏入贡宠予以官作辞命篇。
- [三〇] 颜之推古意。
- [三四] 才调集卷七。唐诗纪事卷六一云：“涂，字礼山，光启进士也。”全唐诗收入无名氏卷一，未知何据。此条承四川师范学院王仲镛同志以出处见告。
- [三七] 援鹑堂文集卷二。
- [三八] 慕贤篇。
- [三九] [六八] 教子篇。
- [四〇] 治家篇。